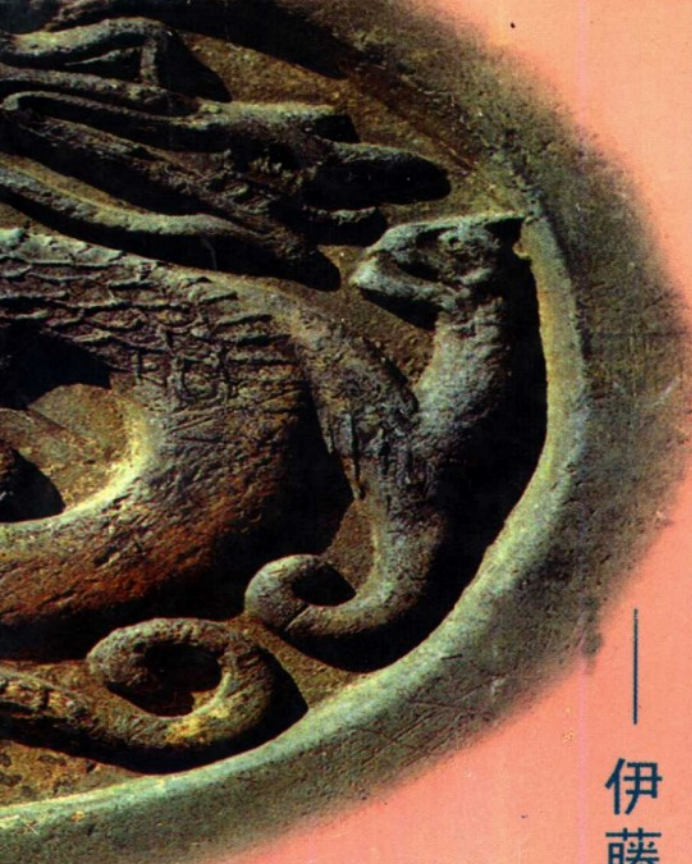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 文化与日本

——
伊藤清司学术论文自选集

〔日〕伊藤清司 著

张正军 译

分类号
著者号
登录号

49.82

Y501

34298

B932

中国古代 文化与日本

伊藤清司学术论文自选集

(日) 伊藤清司 著

张正军 译

云南大学出版社

考古所图书馆



Z0034298



责任编辑：鲁 人

封面设计：丁群亚

责任校对：段建堂

100-2 0.24
北京图书馆
No. 0178660

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

〔日〕伊藤清司 著

张正军 译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云南省建工集团总公司印刷厂印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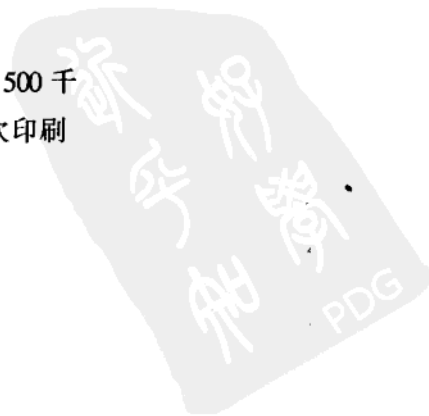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25 字数：500 千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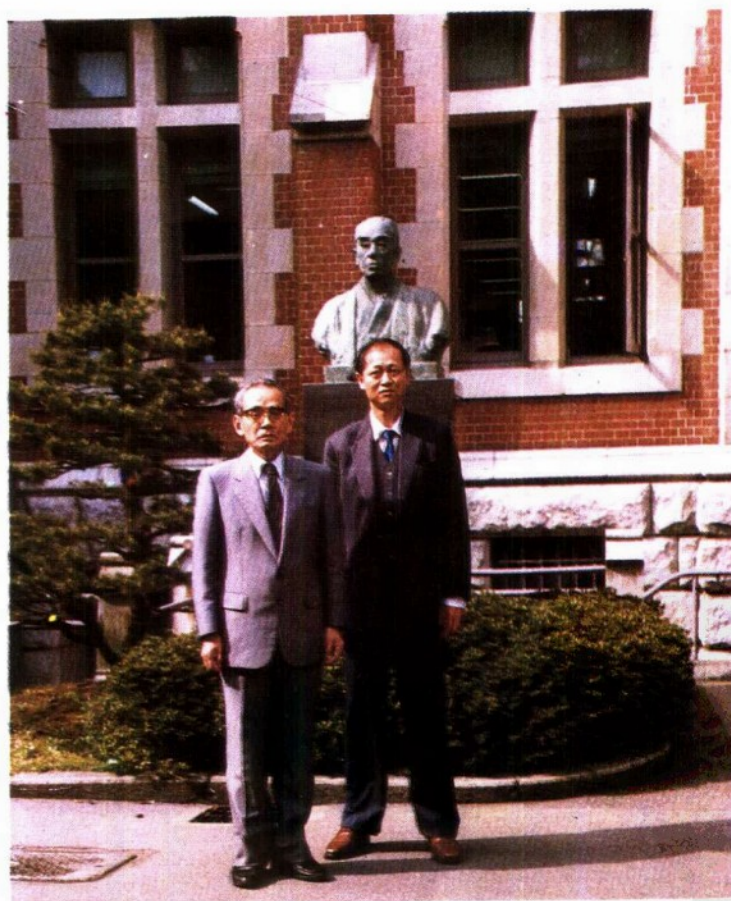
ISBN 7-81025-794-3/G·105

定价：32.00 元





1980年12月摄于北京大学校园。
左起乌丙安教授、钟敬文教授、伊藤清司教授。



1986年作者与李子贤教授摄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1994年8月作者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法脰乡小麦地冲与跳虎节的扮虎者在一起。



1994年8月摄于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正门。

左起：李子贤教授、张文勋教授、伊藤清司教授、杨寿川教授。

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丛书》

弁 言

张文勋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想，民族经济文化的建设，也绝非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我国西南边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南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现在，我们的祖国正掀起“四化”建设的高潮，开发大西南是举世瞩目的宏图壮举；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为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云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并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的高等学府。自1922年建校以来，国内许多知名学者曾在此执教。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学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在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开发西南边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方面，也卓有建树，成绩斐然。以社会科学领域而论，早在三四十

64044/05

年代，我校就有一批著名学者，开始注意对西南地区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他们在财力、物力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经过他们的辛勤耕耘，出版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西南文化研究丛书》。其中有不少著作，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弘扬民族文化，发展西南边疆学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提高云南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研究工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突飞猛进的时代，云南大学也在不断发展中。我们所担负的时代使命更重了，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学校也更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有效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开发大西南服务。

云南大学作为一所综合大学，她拥有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完全有条件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应用性学科的研究。尤应注意结合地方特点，发挥优势，对某些学科领域的研究，争取在国内外取得领先地位。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以民族众多而著称；加之与贵州、四川、西藏、广西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毗邻，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蕴藏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一切，都有待我们去开发研究。因此，学校决定成立“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并以此作为云南大学文科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这既适应我省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可以发挥我校文科的综合学术优势。为了激励大家的研究热情，争取使研究成果得以出版问世，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效益，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丛书》。这将是一套具有较高水平的多学科学术性丛书。其内容包括与西南边疆民族有关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历史、民俗、文学艺术等等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专著。这些专著，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研究成果。入选的原则，决不因人列书，也不存门户之见，举

凡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理论联系实际，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俱在入选之列。在学术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讨论。

为了保证丛书的质量，做好选稿、审稿和出版工作，我们组成编辑委员会。凡是列入丛书的项目，都需经同行专家评审推荐，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对促进我校文科学术研究的开展，促进文科的学科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自序

我曾四度访滇，虽然每次赴滇的季节与目的不同，但必去云南大学。自 1977 年以来，我曾访问过中国十多次，其中，云南省和云南大学是我访问次数最多、印象最深的地方。

1994 年初秋，我第四次访滇，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云南大学授予我名誉教授、图书馆顾问、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研究中心顾问、中文系硕士课程名誉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次学术访问。

以此为契机，通过云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子贤教授的努力，云南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学术论文自选集。我曾在中国出版过两本中文专著，其一是《中国、日本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在华学术报告集）》，这是辽宁大学乌丙安教授努力的结果，1983 年由辽宁大学科研处出版。其二是刘晔原先生翻译的《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9 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论文自选集收集了我大约四十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在日本也尚未计划出版的论文集。

我从 1994 年底以来就着手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分六个方面来选择论文自选集中的论文。本书辑录了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共三十四篇。我舍弃了日本神话、大洋洲及东南亚等领域的学术论文，收录了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及江南、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论文。其中，江南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论文，多少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有关联，作了比较研究。因此，我把论文自选集定名为《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按照原来发表的先后顺序来编排目录。

我在庆应义塾大学读书期间，在松本信广教授的指导下，开始关心中国文化。但是，由于当时全面战争、战败及其它生活上

的影响，直至大学毕业约十年后我才真正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本书首篇《古代中国的祭祀仪式与化装》（载《史学》30卷1号）是约四十年前庆应义塾大学硕士毕业的主论文，与执笔时相比，现在中国的古代文化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也有许多考古发现，因此，这篇论文应作全面修改。其它论文也同样应作不同程度的修改。但是，为了保留当时的原貌，仍照旧实录了。我认为，那样能如实地反映出我的学术经历。我硕士毕业的副论文是《尧舜禅让传说的真相》，这篇论文后来经推敲修改，发表于《神与神话——御手洗胜博士退職纪念论文集》（台北联经事业公司出版），这次与主论文一起辑录在本论文集集中。

本书收录的三十四篇论文中，其中七篇已有中文翻译，发表在中国的《民间文学论坛》等杂志上。关于“日本、中国民间故事比较”的七篇论文曾发表于我的专著《“开花翁”故事的源流——中日故事比较》及《民间故事与传说的系谱——东亚的比较故事学》，其余二十七篇发表于学术杂志及颂寿纪念论文集。大部分论文，不仅在中国，即使在日本，常人也难以见到。

我衷心希望关心斯学的众多中国学者能阅读拙著，并毫无顾忌地提出宝贵意见和批评指正。倘能得到各位中国学者的赐教，能彼此交换意见，将不胜荣幸。我想，这也是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苦劳动、希望中日学术交流日益发展的李子贤教授及云南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心愿。

云南大学日语专业副教授张正军先生，在短期内精力充沛地翻译了该论文集。他在1994年初秋与李子贤教授一同陪我实地考察了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法脿乡小麦地冲。我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教授为本书的出版特意写了序，我感到无比荣幸与欣慰。钟教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有幸拜见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也是我最尊敬的超一流大学者。云南大学的李子

贤教授是最早给我提供学术交流机会的学者，他与钟教授两人一直强有力地帮助我从事中国的学术研究。在此，我对两位学者谨表谢意。

最后，云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的出版，竭尽全力，我在此也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伊藤清司

1995年5月20日

于日本国东京敝舍



序

钟敬文

和华民艺多瓜葛，
细讨深研愧不如。
知尔相传有衣钵，
巍然一老在东都^①。

——赠伊藤清司教授〔1980〕

一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古文明国之一。据我国近代学者们的说法，中国有过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从黄帝纪年算起）。但是，依照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资料推断，我们的古文明，还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以上。记得“五四”运动以后那段时期，有些勇猛的青年学者曾经根据过去文献记载的彼此矛盾的情况，对商周以前的历史和文化，作了较多的否定——所谓“疑古”。这种对古史的态度，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封建史学而发的。从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看，这也可说是进步的——尽管它缺乏辩证法，见解有些片面。时间过去了七十多年，我国现实的学术状况、思想都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学者们的历史观，自然也要跟着情势变化了。我们今天既要历史地理解前辈学者的见解，也要实事求是地尊重新史料的提示。总之，我们今天要敢于向上移动我国古文明史的界标，并引为民族的自豪。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那些经得住时间淘洗的优秀文化，是属于创造它的本民族的，又是属于世界上需要它的各民族的。有史以来，东西方许多国家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的事实，如从中国到罗马的“丝绸之路”、中国文字在东洋各国的广泛传播，都是很好的证明。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对周围、乃至更远的地区和人民，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影响。这是历史记载和民间传承所明示的。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不但有丰富的精英们所创造的上层文化（或说典籍文化），但更多的却是老百姓所创造的民间文化（民众文化）。被世人艳称和我们常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主要就是古代民众所创造的，不过由于群众的身分向来被鄙视，因此发明权就被移植到那些名人身上去罢了。总之，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民众所创造的，不但具有极大数量，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不少是极宝贵的——不管是物质方面（如工艺品），还是精神方面。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功劳大都被抹杀了。但是在国际上，这些文化既为广大人民所享用，其中有的还为他们的学者所鉴赏或探究。它进入有关国家、民族的日常生活和学术领域。它已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

民间文化，种类繁多，其中如民间文学（包括神话、故事、歌谣、谚语等）的数量尤为丰富，并饶有学术价值。我国数千年来这方面所积淀的遗产更是如此。这种文化遗产，通过各种途径（如移民、通商及僧侣士子的往来）传播到周围的民族、国家及地区（例如朝鲜、日本、越南、南洋群岛等）。近代以来，由于各国学术的兴起，我们这方面的民间文化（其实，除了民间文学之外，还有民间艺术、民间信仰以及其它风俗、习惯等）受到国外学者（所谓汉学家们）的注意和探究，并且取得相当成绩。远一点，如法国、美国；近一点如日本，都有这种情形。日本，因为在地理上跟我们接近，制度、文化又长期受到中国的影响、熏陶，所以他们这方面的学术活动更为方便有利，因此，也就更为

活跃。学界曾经有过这样一类的传言：“中国学的重点，在欧洲是巴黎，在东方是日本京都。”所谓中国学，不仅限于民间文化的研究；日本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也不仅限于京都学者。在指出这两点之后，对于那传言是可以首肯的。明治以来，日本学界，确有一批东方史学者在从事我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他们注意到中国的神话、传说、故事等的探索，其中较早的学者如白鸟库吉、小川琢治等，稍后的出石诚彦、直江广治、森三树三郎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但是，这些学者偏重于古代文献的记载（即古典的神话、故事等），而他们也不全是这方面的专家。历史的车轮不断滚滚向前。由于中国民间文学发掘工作的跃进，这方面的资料涌现出新的面貌。在古文献的记载之外，又增添了大量的口传资料的记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邻国敏感的学者们的注意。他们不像他们的先辈只向我们的古代典籍堆里去讨生活。他们把眼光移到许多新出版的神话、传说集、民间故事集，特别是从五十多个少数民族那里发掘出来的这类新资料。他们探索这类新资料，或进而把它去跟本国和其它东方民族的同类作品进行比较，写出许多有份量的论文，乃至专著，使日本学坛这方面的研究增添了许多奇花异草。这方面的学者，虽然并不算太多，但是人数正在不断增加，成果也日益显著。据我们所熟悉的来说，年纪较大的，如直江广治博士、君岛久子教授、泽田瑞穗教授^②，年纪较轻的，如加藤千代、谷野典之，而伊藤清司教授，正是他们中的翘楚。

二

伊藤清司教授，1924年出生于日本茨城县多贺郡。1947年毕业于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史学系。在学中，师从著名东方史学者松本信广教授，受到器重和培植，师生之谊，贯彻始终。

1959年在母校修完博士课程，并留校担任教职。至1970年，升为教授。1988年，依例退休。三年后（1991），提出申请博士学位论文（主论文为《民间故事传说的系谱——东亚细亚的比较故事学》，该论文于同年由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副论文为《中国的神兽恶鬼——〈山海经〉的世界》），答辩会被通过，获博士学位。伊藤教授在庆大退休后，仍在东京杏林大学外国语学部继续教学工作，任教授及学部长等职。

伊藤教授在大学学习时，专攻东洋史学，旁及民族学与民间文艺学。他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民间文化）。1957年，他发表了《古代中国的祭祀仪式与化装》（《三田史学》，30卷1号）等论文，就是这方面学术活动的开始。往后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奋发前进，数十年间，一连写了许多有份量的论文和几部专著。直到最近，他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北京师范大学所开办的“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讲学，讲的还是这方面的课题（讲题名称：《民间故事的传播和变异》、《巫术与习惯法》）。为了扩大和加深他的专业知识，在59岁的年龄，还毅然到中国来留学。在那约一年的时间里（1982秋—1983夏），他既勤奋地阅读着中央民族学院（现改称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书刊，又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中间还应邀到中国一些省市去作学术讲演（1983年春，辽宁大学科研处为他刊行了在华学术报告集《中国、日本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内收报告5篇）。这种精神，无疑正是他忠于学术专业的表现，也是他学术成果可靠性的一种保证。

1980年末，伊藤教授来中国访问以后，结交了我国学术界的许多朋友，并一再来华访问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经常看报，注意中国的学术动态。中国和她的文化，不仅是伊藤教授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样也是他的亲密朋友和眼中的珍贵事物。

伊藤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比较广阔的。他虽然在中国古文

化和民间文化（后者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的探索上倾注了绝大部分的精力。但他的用武之地决不仅限于此。他早年曾经在南洋群岛做过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他 1967 年发表的《所罗门诸岛考古学的民族学的调查报告》（自费出版）、《英领所罗门诸岛调查概况》（《史学》38 卷 2 号）以及《西部所罗门诸岛民的葬制与死者之国》（《民族学研究》，31 卷 3 号）、《美拉尼西亚伦纳尔岛的故事与他界观念》（学生社，1978 年）等文章，就是他这方面田野作业的成果，也是他对于民族学和民俗学贡献的一部分。

日本是伊藤的祖国，又是富于民间传承文化的一个国度（记得柳田国男先生曾以此自豪），也是在文化、学术上哺育了他的国度。作为一个东方史学研究者，他怎能对她的生活习俗、口承文艺等漠不关心呢？自然，事实决不是如此。他像热心于邻国的古文化、民间文化的探索一样，也热心于本国神话、民间故事及习俗等课题的探索。他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上是不不少的，这里试略举一、二例吧，如《日本神话的性格与系统》（《言语生活》，244 号）、《冲绳的兄妹婚》（《冲绳的课题》）、《砍竹故事与民俗学》（《民族学研究》，38 卷 2 号）、《天孙降临》（《日本发见·神们之里》）、《日本民间故事的系谱》（《日本民间传承的起源》）等等。至于那些目的在比较日本、中国等关于神话、民间故事和民俗的论文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从 1949—1991 的四十多年间，伊藤教授所写作的关于中国、日本、南洋的学术论文，总共有一百四十多篇，同时期出版的这类著作等共 13 本（内有二册如《东洋史》等，是跟别的学者合著的），编纂或监修的共七种（多数是与别的学者共同负责的）。（以上统计，根据 1991 年刊行的《中国的历史与民俗》一书中所提供的资料）。从这些简单的统计材料，可以想见伊藤教授在这些时期中，对东方史学涉及的广泛和深入，特别是他在这方面费去的精力的巨大。这横跨国界研究的学术业绩，使我们这些邻国

的学人和同行，既不胜钦佩，也不胜感激和惭愧。

三

中国古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探索，是伊藤教授学术活动的重点，也是他的《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这部论集的主题，自然也是学术成绩和学者风范的体现。对此，我想谈谈个人阅读所得的一些感受较强之点，藉以就正于著者和广大读者。

一、涉及课题的广泛

伊藤教授的中国学，虽然有它的主峰（如神话、民间故事探论），但是，同时又是群峰竞秀的。记得我较早接触到他的《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及其它的一些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的论文，虽然对他的那些博洽、精彩之处感到惊讶和佩服；但是，心里却以为他只是个优秀的民间文艺学者，他的学术范围和成就只局限于中国神话学和民间故事学。后来继续读了他的《中国的神兽恶鬼——〈山海经〉的世界》和其它一些关于中国汉族及少数民族的民俗论考，特别是看了他的《主要著书·论文目录》之后，才恍然于教授在学海里的广泛航行。他对中国文化所涉及的方面和实际课题已经非常广阔（这点，大家只要把本书的目录细看一下，就可以了然于胸）。比如上文所提到的，他还是南洋民族学的研究者和本国神话、民间故事学及民俗学的行家。这说明我原来的所见不广。从另一方面说，由于伊藤教授这种涉及广泛的文化领域的研究，才使他的中国学研究更具有足够的份量。这也就是智识学上的一种量与质的辩证法关系吧。

二、知识结构的充实

伊藤教授在他的中国学论著中所显示出来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具有丰富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并且善于运用它，因而使他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说服力。我们知道，研究一种